

## 中法关系研究的开拓性著作 ——评杨元华新著《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

吴景平

近代以来中国和主要大国间的双边关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著述颇多。其中,有关中国和美、英、苏(俄)、日、德等国的双边关系著作,近年来均各有一种以上问世。但有关近代以来中法关系的著作,却一直付诸阙如。

1994 年 4 月,组阁刚刚一年的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访华;同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法国。这两次访问无疑是中法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同时也使得对中法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正因为如此,杨元华先生积数年之功所著《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 1844—1994》(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以下简称《中法关系》)一书的问世,使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终于得到了填补,从而受到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和好评。

据我所知,杨元华先生对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研究用力甚勤,10 余年前,他便开始了《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 1840—1986》书稿的写作(该书已于 1990 年出版),当时就注意较全面地收集中外关系史的资料文献。正因为如此,在《中法关系》的撰写过程中,杨元华能够较充分自如地运用业已刊布的相关资料文献,包括晚清外交档案、民国政府外交文件、主要的中外约章、政要和外交使节的回忆,以及报刊资料,从而在国内学术界第一次成功地构建起近一个半世纪的中法关系的框架,清楚地揭示了两国演变发展的基线。

主题鲜明,是《中法关系》一书的特点。从 1844 年到 1994 年的整整一个半世纪里,中法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要在 20 余万字的篇幅内一一展开,显然是不可能的。作者以中国作为考察的本位,紧紧围绕着“从屈辱到崛起”这一贯穿中法关系乃至整个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主题,从而也就在宏观上准确地把握了中法关系演变发展的基本脉络。

正如该书所揭示的,近代以来中法关系的第一页,便是法国侵略者利用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紧接着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法《黄埔条约》;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侵华的列强中,法国一直位居前列:利用“马神父案”,和英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火烧圆明园”的元凶之一,在 19 世纪 80 年代,急于在远东加快扩张步伐的法国又在越南、福建和台湾向中国方面发起军事侵略;在 90 年代的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法国虽然没有直接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却凭藉“俄法借款”攫取了经济上财政上的权益;又通过所谓

的“干涉还辽”，进一步把中国的西南地区划入为势力范围；紧接着在列强对华的瓜分狂潮中，强行租借了广州湾；而在19—20世纪之交的八国联军侵华中，法国侵略者的凶残、贪婪，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各国，在总额达4亿5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法便占15.7%强，仅次于俄国和德国的份额。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法国军队的铁蹄不复在中国国土上践踏。但两国关系远不是平等的。作者拈取了诸如北洋时期的金法郎案、中日战争时期的印度支那过境交通交涉、维希政府与汪伪政权的往来、抗战结束后中法在越南的磨擦等为一般读者不甚了解、但又在双边关系演变过程中地位颇为重要的典型事例，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书中对1949年以前中法关系的评述，给读者以下启迪：包括法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固然是导致近代中国屈辱地位的外来原因；但是，旧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落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国力的衰微，却是内在的根本性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如同整个中外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样，中法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阶段的中法关系研究，在国内几乎完全是空白，缺乏基本的资料和参考文献。杨元华先生知难而进，对近数十年的报刊资料和多种回忆资料，作了仔细的梳理，从而得以在《中法关系》之中，以三章的篇幅，对新中国和法国的关系作了介绍，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的双边往来也有所涉及。其中以戴高乐将军为总统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与新中国建交的由来和影响、1989年以后两国关系的曲折反复、90年代初因法国方面对台湾出售军火而引起的风波等重大交涉，更作了较详尽的叙述和颇具识力的评析。读了这一部分内容，人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新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以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和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也是中法关系和整个中外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这部著作也告诉人们：国际关系的演变受制于种种复杂因素，出现曲折反复并不足为奇；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等旧有国际秩序的产物，终将被整个人类进步的潮流所荡涤，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外交方针和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并正确应用策略原则，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到来则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国内第一部中法关系史著作，该书也有其难以避免的缺憾之处。就整体而言，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政要和外交官的活动所占篇幅较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关系以及双边民间交流往来则显得过略偏少；而后者作为双边关系中的稳定性、基础性的部分，在书中应有更多的展现和评价。此外，如能适当运用法国方面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该书将更为增色。